

逻辑学家汪奠基

刘 培 育

汪奠基（1900～1979）亦名三辅，号芟芜、山父等。著名逻辑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逻辑研究室顾问。曾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国科学院支部委员。

一

庚子年闰八月，汪奠基出生于湖北鄂城段家店永三村。他的童年是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度过的。

奠基从六、七岁开始念私塾，后来到鄂城东路小学和县立寒溪中学读书，学习很是刻苦。父亲让他背书，他每次总是倒背如流。私塾先生和乡亲们都称赞奠基是“神童”。

1916年夏，汪奠基离开家乡到北京大学读书。开头入北大理科学生主办的补习班学习半年，接着旁听理科本科冯祖荀先生的分析数学和王仁辅先生的解析几何课。后来听文科本科的哲学、文史等课程。刘师培、辜鸿铭、黄节等先生的课，使年轻的汪奠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期间，汪奠基还在北大夜校教常识、算术、英文等课程。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汪奠基和许多爱国学生一起到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高呼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表现了青年学生的耿耿爱国之情。

为了寻求科学，寻找真理，同年秋汪奠基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1924年，他先后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学习高等数学、哲学与数理逻辑等课程，获三张高级文凭，按法国学制规定，承认大学毕业。1924年夏，入巴黎大学研究班继续深造。汪奠基于1925年5月回国后，经蔡元培介绍到北京大学教书，主讲哲学、法文和西洋逻辑史三门课，先后任讲师、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教育系教授、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法国文学和法文课教授、中国大学和北京女师大哲学系教授。这个时期，他写了《数学史》、《逻辑与数学逻辑论》、《哲学与科学》、《科学方法》等讲稿和书稿。1926年参加中国哲学会。

1927年暑期，南京大学院决定在上海真如成立国立暨南大学。汪奠基奉调到暨南大学任教务长，兼教育系、数学系及师范专修科主任。1928年暑期前汪奠基离开暨大到湖北武汉，任湖北省汉口特别市党务训练所教务长。8月，加入国民党。1929年1月任汉口市党部委员、常委、宣传部长，兼湖北日报总编。同时兼任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武昌中华大学校董、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29年春末，国民党蒋桂内战加剧，武汉的李宗仁、胡宗铎等桂系军阀失败。4月，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开除汪奠基党籍，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于是汪奠基逃离汉口，到上海租界避难。

在上海期间，汪奠基同习文德、涂允櫟等创办《和平奋斗》月刊，共出三期。后经李济深介绍，到广州、香港谋事。事未成，便于同年10月到沈阳，在东北大学哲学系任教授，讲授经验派与理性派认识论哲学和逻辑学。“九一八”事变前夕回到北平。

汪奠基从1930年起，任中国哲学会理事。

1931~1937年，汪奠基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哲学系任教授，兼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中法大学

社会科学院) 哲学系教授、中国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等职, 教西洋哲学史、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其间, 同严几澄、李季谷等教授创办《鞭策周刊》。这个时期, 他出版了《现代逻辑》一书。

“七七”事变后, 汪奠基离开北平。1938~1940年, 他先后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今论衡》主编, 西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讲授哲学和逻辑。1941年10月到峨嵋四川大学文法学院任教授, 教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史、哲学概论和逻辑等课程。后改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代院长, 兼公民训育系主任。这个时期, 他出版了《理则学》, 编著了《中国政治哲学史》一书。

1944年11月, 汪奠基奉调任湖北师范学院院长, 兼史地系主任。1947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讲授形而上学及认识论等课程。

1947年夏汪奠基回到北平, 到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授、系主任, 兼中国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直到北平解放。

1951年, 汪奠基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一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 他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 讲授逻辑学和西方逻辑史等课程。1955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主要从事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工作, 指导中国逻辑思想史专业研究生, 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兼逻辑史课程。

二

治学者, 不一定教学; 但教学者, 一定要治学。汪先生说: “在大学讲课是占着一个学术讲台, 导引学生进入学术宫殿”。他在教学过程中, 勤于治学, 精于治学。从五十年代开始, 他又专门从事研究工作, 一生出版了近十种著作, 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

汪先生青年时代受杜威学术讲演的影响，对数理抽象思维产生了兴趣。他在北大学习期间，选修了数学和逻辑，陈大齐先生是他的老师。到法国后，继续钻研数学和数理逻辑，他的导师雷诺韦尔是当时法国知名的哲学和数理逻辑学家。他在法国巴黎大学登记的博士论文是《逻辑与数学逻辑论》。1925年，他回到祖国，深感国内数理逻辑的薄弱。他一面在大学里讲授数理逻辑，一面修改自己的博士论文稿，1927年用中文出版了。该书用极为简明的历史叙述方法阐述了形式逻辑的历史发展。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本内容，叙述传统逻辑的发展历史；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罗素的命题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的基本内容，并指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局限性和莱布尼茨数理逻辑的不足，阐述了现代数理逻辑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汪奠基在介绍类演算时明确地区分了“属于”和“包含于”两个关系概念，把一个类和以这个类为唯一元素的类明确区分开了，这是难能可贵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数理逻辑的第一部著作。

1937年，汪先生又出版了《现代逻辑》一书。他参考英、美德、法等国各派的逻辑理论，在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逻辑的两个演算、公理论和演绎模型等内容。该书对传统逻辑进行了批评，指出了其局限和不足。今天逻辑界所谈论的传统逻辑的局限性，他在五十年前基本上都讲到了。和传统逻辑相比，现代逻辑是巨大的进步，他怀着极大的兴趣，高瞻远瞩，展望了现代逻辑的美好前景。

汪先生以上两部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著名哲学家贺麟说：“近年来对西洋的数理逻辑，国内学者有相当深的研究，且有新的贡献者，颇不乏人。”贺麟认为汪奠基“数学基础特佳”，是代表者之一。（《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1935年12月，著名数理逻辑学家莫绍揆教授

在金岳霖学术思想讨论会上说，他青年时代开始接触数理逻辑时，就读过汪先生的数理逻辑著作。

1949年以后，汪先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工作上。人们都知道，1949年前我国虽然出版了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英文版）和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中华书局，1932年）等书，但他们的眼界都局限在先秦。1949年后，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几乎是一片处女地。1956年，国家制定全国科学规划时就明确地指出，要加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前辈们留下的成果不多，开拓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是异常繁重而艰巨的。汪先生决定啃这块“硬骨头”。他下决心把中国历史上的典籍全部翻检一遍，审视一遭，用第一手材料写出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逻辑思想通史。经过反复、周密的思考，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分三个步骤的研究和写作计划。

第一步，全面系统地搜集逻辑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这些史料，编辑《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一书。全书拟编四辑：先秦史料分析两辑，秦汉至隋唐史料分析一辑，宋以后直到“五四”时代史料分析一辑。其中第一辑“从邓析到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史料及墨辩的逻辑科学史料分析”，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第二辑于1964年交稿，一直没有出版。以下两辑，有的稿子在十年动乱中失落了，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完成。

第二步，撰写《中国逻辑思想简史》。这部《简史》的初稿于1960年底完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1961年春，中国哲学会召集京津地区逻辑和哲学专家四十多人就《简史》初稿进行座谈，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这部《简史》初稿，认为“它是中国逻辑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对于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是个良好的开端”。专家们还着重指出，汪奠基对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逻辑思想、思维形式等方面都有过建

树、创造和发展；可以说明形式逻辑反映的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它有助于丰富逻辑教学内容；也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它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会的专家对《简史》初稿也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1961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探讨先代对逻辑思想的建树、创造和发展——哲学会座谈中国逻辑史问题》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此后，汪先生又对《简史》进行了多次修改，197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包括绪论和三编。绪论有三万多字，详细阐述了作者对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对象和特点的认识。他认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研究所有留在旧中国哲学和一切科学思想范围内的有关形式逻辑及辩证思维方面的思维形式法则及其理论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他对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个突出的特点，即他不仅认为有关形式逻辑的理论认识发展是中国逻辑思想史所要研究的，而且关于辩证思维的形式法则及其理论认识的历史也应该是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对象。他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尽量吸取历史上的逻辑遗产”而有意“把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放宽一些。”关于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特点，他概括为四点，即中国的逻辑思想从一开始就与伦理学相联系，并为其服务；中国逻辑思想从未与政治脱离，始终服务于政治；古代逻辑思想具有演绎的。玄学的特点；正名主义的“正统”思想与名家的名辩思想相矛盾。他指出的中国逻辑思想具有与伦理、政治相联系并为其服务的特点，是非常正确的。该书的第一至第三编共十五章，系统地讲述了我国从先秦到“五四”运动前夕的逻辑思想发展史，提出了一些新颖的看法。择其要者有：

（一）汪先生指出，先秦名家不限于邓析、惠施一派，应广泛地包括所有名辩学派的人在内。因此，所谓先秦逻辑思想，实

际上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所有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

(二) 汪先生指出，对《墨经》逻辑的研究，流行的作法是根据普通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证明和反驳等等分章的形式，在《经》、《说》、《大取》、《小取》各篇中提出部分论点加以解释，他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反历史的，不科学的。他在书中就现有《墨经》各篇原文程序进行仔细考察，从而揭举《墨经》的逻辑体系。他依孙诒让《墨子间诂·经上下》旁行表的顺序，把《墨经》四篇分为二十章，用首尾两条的标牒字组成章名，进一步归纳出《墨经》的逻辑要点，肯定后期墨家已经提出了逻辑体系思想。

(三) 汪先生提出，《道德经》第一章是老子“无名论”的一篇逻辑导言，也是老子朴素辩证观念的基本理论。《庄子》书中反映的辩证因素，又大大发展了老子的思想。然而庄周是战国中叶最大的诡辩思想家。

(四) 汪先生认为，王充的逻辑思想主要表现在坚持科学的认识方法上。他坚持把论据的真实性和逻辑论证的正确性统一起来，使感觉经验的事实和心意辩说的认识一致地表达出来，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

(五) 汪先生认为，鲁胜的《墨辩注叙》对于中国逻辑思想史，特别是中世纪的逻辑思想史具有极大的科学文献价值。它不仅对先秦逻辑作了简短的总结，并且指出了研究逻辑史的重要任务和整理逻辑史料的方案，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六) 汪先生认为，魏晋时期的“连珠式”都具有前提和结论，是中国古代逻辑的一种推论形式。

(七) 汪先生认为，唐玄奘介绍的印度因明，从逻辑论辩的形式来说，是值得重视的。他指出，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应该是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组成内容。

(八) 汪先生指出，王夫之在逻辑认识上表现为辩证思维，

他提出的“学思兼致”即是“质测之学”与“探索推证”并用的逻辑科学方法。

(九) 汪先生把严复和章炳麟的名学思想,作为“五四”运动前夜中国逻辑界结合外国逻辑形式来发展中国逻辑思想的代表,给予了充分重视。

以上各点,都是汪先生经过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尽管在学术界不一定取得共识,但却给人以启发。

《中国逻辑思想史》这部书的逻辑史料甚丰,不仅包括两千多年来的逻辑著作,也有哲学著作和政论文章中的逻辑思想资料;还广泛搜集了文学和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地学、医学、农学等)中的逻辑思想史料。书后附有《关于中国逻辑思想史参考书目》,作者对有些参考书还指出了阅读要点及取材方面的意见,为从事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青年同志寻找古代逻辑文献,提供了很大方便。

需要说明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汪先生这部著作时,征得作者同意,删去了《“五四”前后五十年间的逻辑思想运动》一章,还把书名上的“简”字去掉了。

汪先生所以把这部30多万字的书稿称为“简史”,是因为在他的研究计划中,第三步要在“简史”的基础上写出一部内容更为详备的中国逻辑史。这第三步工作是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里开始的。1971年元月,根据组织的安排,汪先生和其他老先生从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他一边参加学部北京留守处规定的学习会,一边抓紧时间撰写大部头的中国逻辑史著作。到1973年1月,他写出了《先秦两汉逻辑史》稿,近20万字。这部书稿不仅扩充了《中国逻辑思想史》相关章节的内容,增加了新的章节,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作者把先秦名辩思想,概括为正名论、名实论、形名论及名理论四大类型;总结出韩非形名参验的五种逻辑形式,即辩式、说式、解式、喻式及难式;更明

确地提出“疾虚妄”与“正真是”是王充的两大逻辑认识等等。可惜这部书稿至今没有出版。汪先生逝世以后发表的《唯物论者荀况的逻辑思想研究》和《韩非的逻辑思想概述》（刊在刘培育等编的《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一书中，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就是其中的两篇。汪先生由于健康原因，原计划撰写的更为详备的中国逻辑史巨著没有最后完成。

汪先生在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里探索二十多年，除上述两部著作外，还出版了《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逻辑史的专题学术论文。汪先生的这些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赞扬。他在《丰富的中国逻辑思想遗产》一文中写道：“研究逻辑史，必须联系到历代科学思想发展情况”。“整理中国逻辑史的材料，必须深入地研究有关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全部问题，特别是有关历代科学思想的实际问题”。这一思想在自然科学史界引起了反响，推动了科学史工作者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汪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史》被上海人民出版社评为优秀图书。

三

1940年，四川大学毕业生请汪奠基教授示以治学方法，汪先生写了下面一段话。

余以为学者必有求端致力之方，如举纲提目，振衣挈领，从而近思体念，寻绎入里，复引申触类，目虚融蓄察，则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论语》谓谁能出不入户，何莫由斯道也。学者如错用心力，唐废光阴，终身难得一明了知识。古人以学思并论，若徒夸记诵，狂肆辞说，目虽间有私义，焉知统类？所谓炫闻守曲，行一不该，绝非通学。读中应以涵养敬事为功夫，以持志率气为守恒，不迁为收摄，因修

显性，强立不反，是谓学之至也。

这也是汪先生治学经验的总结。

汪先生认为，作学问的人必须热爱学问之事，对作学问有正确的态度，“以涵养敬事为功夫，以持志率气为守恒”，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作学问中去。汪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文革”后期，无休止的清查运动，不间断的交代汇报，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心脏病又时常发作，使他苦不堪言。然而他仍严格遵守自己规定的工作时间表：上午7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2时至6时，晚上7时30分至11时30分。星期天上午工作，下午休息。有时感冒发烧，他夫人让他休息，他总是说：“只要能吃饭，就要干工作。”他的《中国逻辑思想简史》书稿的修订和详备的《中国逻辑思想史》初稿（先秦两汉部分）的撰写，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这对于古稀之年的老人，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汪先生强调，作学问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自然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做到提纲挈领，近思体念，寻绎入里，引申触类，虚融蓄察，则天下之理可得。他一生把对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研究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写出了多种有关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著作。

他探索问题经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汪先生研究数理逻辑时，和传统逻辑相比较，指出传统逻辑之不足和数理逻辑的补足作用。他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因明作比较，从中找出三者的同和异，在比较中揭示中国古代逻辑的本质和特点。

汪先生注意考察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从中看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方法不仅在他写的《中国逻辑思想史》、《西方逻辑史》、《归纳逻辑史》、《数学史》、《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史》等几部关于史的著作和讲稿中有明显的体现，而且贯穿在他撰写

史，从中发现现代逻辑诞生的必然性和光明的前景，使他的论证增强了说服力。

汪先生对于自己的学术成果不断进行反思，也注意倾听同行的评议。他的态度是两条：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不怕批评，不随波逐流；自己认为错的就改正，不固执己见，不怕否定自己，不搞一贯正确。1961年，《中国逻辑思想简史》初稿写成，他把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对象定义为：研究有关形式逻辑及辩证思维法则的理论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在书稿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建议汪先生改变对中国逻辑思想史对象的定义，去掉辩证思维内容，专讲逻辑形式发展史。汪先生以为不妥。他在两年后所作的《中国逻辑史稿》“跋诗”中写到：“尚有名书降未得，穿言龙悖术难焚”。他引《公孙龙子·迹府篇》的故事说：孔穿愿为公孙龙弟子，请公孙龙去其守白之学。公孙龙曰，去此术则吾无以为教也。今之读《中国逻辑思想简史》者，亦愿余去所持中国逻辑史对象之说，专讲逻辑形式史，于是何古今悖之同见也。这是他坚持己见的一例。而另一例则是他自我否定的。1949年以后，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真心实意地接受马列主义，不断清算自己过去的思想，包括学术思想。他在一首绝句《题旧写稿后》中写到：“年年过去空空了，处处翻来句句非”，说他每当整理旧稿时，即有“翻来句句非”之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逻辑思想史》时删去的最后一章书稿中，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自己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一书，说“这是一部站在西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逻辑观点上来介绍形式逻辑发展与数学逻辑思想产生的参考书。……由于全书叙述欠清晰，没有从科学上明确两者发生发展的基本关键，所以不能对这一科学的认识（按：指‘数理逻辑形式的必然产生’）作出合理的解释。”汪先生对自己的批评和否定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他认真检讨过去，不怕否定自己的思想品格是每个作学问者不可缺少的。

汪先生在家里是严父，在学生面前是严师，在作学问上是严肃的学者。然而在夫妻之间、朋友之中，他是极有情趣的。他酷爱诗词、绘画、书法、篆刻，不但有很高的鉴赏力，还有深厚的创作功底。

汪先生不仅写诗作画，对诗道画理也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只有唐诗情入画，尚无宋苑理犹空。丹青未许玄同道，笔底乾坤自在中。”他认为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远。匪情近于诗，而诗近于情也。岂特作诗如此，即作画亦无不然也。所谓可解不可解之间，使人意会而不能言传，斯见个里，乾坤自有天放之道在也。这完全是内家之见。

汪先生作为一位教授和学者，他一生都是在抽象思维的海洋中畅游；而他的业余生活，却是漫步在艺术世界里，飞翔在形象思维的天空中。科学的与艺术的，抽象的与形象的，相会在汪先生的身上，融会在他的心中。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

《佛学基础》简介

本书作者杨卓有感于佛学名相浩繁，义类奥博，使一般读者望而兴叹，难所适从；又鉴于《佛学大辞典》、《一切经音义》、《佛尔雅》等书，仅解释名句，不便于一般人阅读之状况。乃综括佛学之历史、教义及有关名词，汇为一编，详为解说，为人们了解、研究佛教提供了一个比较系统而又通俗适用的读本。

本书1992年12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32开 460千字 648页 精装定价：22元

• 耿素丽 •